

翻过那一页：论新时代的文化自觉与重建

陈童

民国是一段复杂的历史。它既是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的过渡，也是传统文化遭遇空前危机、现代文化尚未成熟的阵痛期。今天讨论文化自信，我们必须直面一个事实：民国时期并未建立起真正的文化自信，其文化内核——对传统的否定性焦虑、对西方的仰视性模仿、对自我的碎片化认知——至今仍在以各种形式影响着我们的文化心理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，在文化维度上，首先意味着要翻过民国奠定的这一页，在文明自觉的基础上确立属于新时代的新文化。

一、民国文化的三重困境

民国的文化困境，根源于一种结构性的不自信。

第一重困境是传统的断裂。新文化运动以“打倒孔家店”为旗帜，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延续数千年的儒家传统。这种批判虽有一定的历史必要性——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，旧文化的某些部分确实成为社会进步的阻碍。但问题在于，未能清晰分辨出清朝的落后统治才是中国落后的主因，而是将矛头指向了中华文明本身，使得批判逐渐演变为全盘否定，“传统”被简单等同于“落后”，“现代”被直接等同于“西方”。陈独秀、胡适等人主张的“全盘西化”，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自我否定的激进姿态。当一代知识精英将本文明视为现代化的障碍时，文化自信便失去了根基。

第二重困境是西方的迷思。民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态度，经历了从“师夷长技”到“全盘西化”的递进。他们真诚地相信，西方的民主、自由是普世价值，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。这种信念背后，是一种隐蔽的文化自卑：我们不行，他们行；我们的传统是包袱，他们的传统是资源。杜威、罗素来华时的轰动，对西方哲学的狂热译介，对欧美政治制度的理想化想象，都反映出一种文化心理上的“仰视”。这种仰视，使得民国文化始终带着一种学徒心态，缺乏平等对话的底气。

第三重困境是自我的碎片化。在传统与现代、东方与西方的撕扯中，民国文化未能形成有机统一的新形态。一方面，旧的文化符号被解构，新的意义系统未能建立；另一方面，各种主义蜂拥而入，实验主义、无政府主义、马克思主义、国家主义……知识分子在主义之间频繁转向，社会缺乏基本的价值共识。鲁迅笔下的“彷徨”、茅盾描写的“动摇”、沈从文呈现

的”边城”——这些文学意象都指向同一个现实：那是一个文化认同混乱、精神家园失落的年代。

这三重困境构成了民国文化的内核：否定传统、迷信西方、自我分裂。这个内核不是某个人的发明，而是一个文明在其最低谷时期遭遇强势他者时的应激反应，是”落后就要挨打”的焦虑在文化领域的投射。理解这一点，不是为了苛责前人，而是为了认清我们今天仍需面对的文化遗产。

二、民国文化内核的当代遗存

令人深思的是，民国文化的这一内核并未随着1949年政权的更迭而消失。它以变形的方​​式延续下来，至今仍制约着我们的文化自觉。

在学术领域，”以西释中”的范式长期占据主导。研究中国哲学，要用康德、黑格尔的框架来套；研究中国文学，要借用叙事学、符号学的理论；研究中国历史，要套用西方现代化的理论。不是说这些西方理论没有价值，而是当我们只能借助他者的概念来理解自身时，说明我们尚未建立起自主的知识体系。费孝通晚年提出”文化自觉”，正是对这一现象的深刻反思。

在社会心理层面，一种”民国怀旧热”悄然兴起。某些人将民国想象为”大师辈出”的黄金时代，将那个战乱频仍、民生凋敝的年代浪漫化为”自由”与”风雅”的象征。这种怀旧，本质上是对当下文化现状的不满，也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美学的无意识认同——因为民国文化的”魅力”，恰恰在于它更接近西方现代性的想象。这种怀旧情绪，非但不是文化自信，反而是一种文化逃避，是用想象中的过去来回避构建现实的挑战。

在创作领域，民国题材的作品往往陷入两种套路：要么渲染才子佳人的风花雪月，将苦难历史审美化；要么延续”启蒙-救亡”的叙事框架，将复杂历史简化为进步与落后的二元对立。这两种套路，都未能跳出民国文化设定的议题和情感模式。

更深层的问题在于，我们仍然习惯于用”先进/落后”的二元框架来评判文化。讨论传统文化，有人立刻想到”封建糟粕”；讨论文化创新，有人立刻想到”接轨国际”。这种思维惯性，正是民国文化内核的当代显现。它让我们在讨论”文化自信”时，往往底气不足，仿佛自信是一种需要论证、需要许可的姿态，而非一种理所当然的文明立场。

三、新时代新文化的建构路径

翻过民国奠定的这一页，不是否定那段历史的一切成就，而是要在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，超越其文化内核的局限，建构真正属于新时代的新文化。这一新文化应当具备三个特征。

第一，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，而非简单否定。传统文化不是博物馆里的文物，而是流动在民族血脉中的活的生命。新时代的文化自信，首先建立在对这一生命体的重新理解和激活之上。这意味着我们要区分传统文化中“过去时代的具体形态”与“超越时代的普遍智慧”——三纲五常的具体伦理规范可以批判，但仁爱、诚信、和谐的价值理念可以继承；科举取士的制度可以扬弃，但选贤与能、重视教育的传统可以转化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“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”，正是这一思路的集中表达。我们不是要回到过去，而是要让过去的精神资源为当下和未来服务。

第二，对西方的平等对话，而非盲目模仿。全球化时代，文化交流不可避免，但交流的姿态至关重要。新时代的文化自信，意味着我们承认西方文化的一些成就，但拒绝将其神圣化为唯一标准；我们学习西方有益的经验，但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进行选择吸收；我们参与全球文明对话，但带着自己的问题和视角，而非仅仅作为西方理论的验证案例或应用场地。这种平等对话的能力，建立在自身文化主体性的确立之上。正如经济学需要中国学派、政治学需要中国话语，人文学术同样需要在吸收全人类优秀成果的基础上，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。

第三，对现实的深刻把握，而非浪漫逃避。新文化必须直面当代中国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。这里有世界最大规模的工业化、城镇化进程，有脱贫攻坚的人类奇迹，有科技创新的突飞猛进，也有社会转型的复杂矛盾。这些活生生的现实，是文化创造的真正源泉。脱离这一现实，无论是回到民国的怀旧，还是模仿西方的移植，都只会产生无根的文化浮萍。新时代的文艺创作、学术研究、思想探索，都应当深入这一伟大实践，从中提炼主题、萃取题材，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。

四、文化自信与民族复兴

文化自信是更基本、更深沉、更持久的力量。这一判断的深刻性在于：经济的崛起、科技的进步、军事的强盛，如果没有文化的支撑，便缺乏可持续的内生动力；而文化的繁荣，如果建立在对他的者的依附或对传统的割裂之上，便缺乏真正的主体性和创造力。

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，在终极意义上是文明的复兴。这意味着我们要在人类文明的版图中，重新确立中华文明的位置和贡献。这不是要复古，也

不是要对抗，而是要通过自身的现代转型，为人类文明提供新的可能性。当我们的发展道路能够为解决人类共同问题提供启示，当我们的价值理念能够为全球治理贡献智慧，当我们的艺术作品能够引发世界范围的共鸣——那时，我们才可以说，真正翻过了民国那一页，建立了新时代的文化自信。

这是一项艰巨的事业，需要几代人的持续努力。它要求知识分子走出书斋，深入现实；要求创作者扎根大地，拒绝浮华；要求每一个中国人重新认识自己的文明，既不妄自尊大，也不妄自菲薄。

民国那一页，记录了先辈的探索与挣扎、理想与局限。尊重它，研究它，然后翻过它——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文化使命。新时代的新文化，正在我们手中生成。